

论儒家伦理学说对当代中国思想建设的价值

刘惠恕

儒家伦理学说曾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精神支柱,它对当代中国思想建设是否还有保留价值?最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五四”时代的启蒙学者。他们认为:“儒家之主张,徒会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①也就是说毫无价值可言。时至今日,“五四”时代学者“打倒孔家店”的主张可以说是早已得到了实现,但是当中国现代化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时,保持着良好儒学传统的“亚洲四小龙”却率先建立起了现代化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他们把经济成功的基本经验归结为儒学的精神动力。李光耀认为:“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股推动力是:大多数的人民,把社会利益的重要性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社会比个人更为重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单位,把所有的家庭组合起来,就形成一个社会。”^②假如说儒家伦理学说确曾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繁荣起到过推动作用,那么这种学说对当代中国的思想建设是否还是具有保留价值,就作为新的问题提出来了。笔者认为: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儒家伦理学说,虽曾具有如“五四”时代学者所指出的那种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消极因素,但也具有促进中国社会前进的积极因素,这便是儒家伦理学说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建设的保留价值。这种价值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儒家所倡导的修身意识对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启发作用。

儒家所提倡的修身路线,被曾子归结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九个字,^③也就是

说:要通过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最终达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完善。这也是儒家伦理学说的宗旨所在。如果对比先秦法家所主张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兼并路线,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则更多地强调人们通过道德标准或伦理风尚的统一,而不是通过战争兼并手段来解决民族和国家间的纠纷,最终达到中国社会的统一。因此说儒家的这条修身路线,实质上是中国人文主义的理性统一路线。尽管在先秦时期,因列国纷争而并不实用,但它对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古代汉民族是多民族的融合,在幅员辽阔、地理情况复杂、交通又极其不便利的古代社会,它基本上维持了统一。这也是历史进入现代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人文地理基础。这一切靠得是什么呢?可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儒家修身路线对此所发生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因为它强调人自我修身的重要性,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的社会风尚统一或伦理道德观念的统一。这最终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统一。之所以讲这一修身路线对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仍具启发作用,这首先是因为它强调了对一个国家的稳定来说,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通过个人自我世界观或道德改造的方式,创造出和睦的人际关

①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4 页。

② 见新加坡《联合早报》1987 年 1 月 8 日刊李光耀答记者问,转引自 1987 年 1 月 12 日《参考消息》。

③ 《大学》,此书是否为曾子所作,史学界无定论。

系,最终改善个人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这其次是因为为实践这一修身路线,儒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身方法,对这些修身方法,若撇除其陈旧的伦理内容,它的某些形式对今人仍有借鉴价值。如曾子所提倡的“吾日三省吾身”的方法,曾被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中所推重,彭德怀同志在繁忙的国家工作中,也典范地实践了这一修身准则。

(2) 儒家社会理想对中华民族的凝聚作用。

儒家社会理想与其修身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前者是目标,后者是途径。儒家的最高社会理想是“大同”,即实现“天下为公。”^④但是儒家认为:“天下为公”不是能立即做到的,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他们反对贫富间过度悬殊,主张实行“小康”。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⑤这是对小康精神的基本概括。从这一思想出发,孟子设计了从均田为目的的“井田”方案。以后在儒家社会理想的鼓舞下,中国曾多次出现以缩小贫富差距为目的政治改革和农民起义。政治改革有北魏至唐代实行的“均田”制度,有王安石、张居正“摧抑兼并”的变法。农民起义有: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宋代王小波、李顺、钟相、杨么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及近代太平天国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在其颁发的政治纲领《天朝田亩制度》中,直接把实现孔子的“大同”理想,作为起义的号召。这些在历史上发生的以实现儒家社会理想为目的的政治运动,都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说儒家社会理想至今对中华民族仍具凝聚作用,这首先是因为“大同”学说尽管虚幻;但与人类共产主义远景并非实质性的矛盾。在近代史上,中国民众之所以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理论,与儒家“大同”理想千百年来对中国民众的精神熏陶不无关系。其次是因为:儒家所提

倡的“小康”理想,即反对贫富间过度悬殊的说法,并不违背中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可以借“小康”之名,提倡人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实。再其次是因为借用“大同”、“小康”的说法,有助于大陆民众与海外侨胞的思想统一,有助于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和平统一政策的实施,最终也有助于中国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

(3) 儒家实践伦理观念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作用。儒家实践伦理观念,是指见于《论语》的忠、恕、孝、悌、仁、义、礼、智、信等具体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由于具有以“仁”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合理内涵,因此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对中国的稳定,曾发生过重要作用,它在客观上起了联结中华民族存在的精神纽带作用。孔子曾对儒家实践伦理观念的合理内涵,做了“仁者,人也”的解释。由此出发,他强调“重人事”,反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过度欺压。孔子反对殉葬制度,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反对统治阶级与民争利,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百姓不足,君孰与足。”^⑥他平生所重视的是“民、食、丧、祭”四件大事^⑦。孟子沿着孔子的人道主义思想继续前进,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主张,他教导人民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所以说儒家的这些实践伦理观念至今对中国社会具有稳定作用,这首先是因为它包含着积极入世的思想,即强调个人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注,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思想具有教育和鼓舞今人积极参加时代政治运动,热爱祖国和人民,反对宗教和迷信的作用。其次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提出的一些实践伦理观念,

④ 《礼记·大同》

⑤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

⑥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⑦ 《论语·尧曰篇第十二》。

有的至今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行为规范,并对当代社会发生着利和弊两方面的影响。如个人对家庭所承担的义务思想——孝;个人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思想——忠;个人对生理欲望适度节制的思想——礼;朋友相互之间所承担的义务思想——义等等。对这些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实践伦理观念,我们要彻底铲除,很难做到。要创造出另一些新的实践伦理观念加以取代,也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奏效的。比较可取的作法,则是像新加坡那样,对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实践伦理观念,加以批判改造,注入新时代的政治内容,使它发生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益的影响。再其次是因为:儒家在历史上为宣传自己的伦理主张,所创造出的一些有效教育方法,至今值得后人学习。如:孔子所提出的“有教无类”、“举一反三”、“因材施教”等教育原则;他所从事的礼、乐、射、御、书、数等教育实践,包含着德、智、体、美等现代教育的四大要素;他所说的“人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⑧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心理学。在儒学精神的熏陶下,中国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在诗、书、琴、画、棋艺等方面,一般都有着较高的修养,并影响了整个社会风气。孔子游武城,“闻弦歌之声”,^⑨中国也由此得到了“礼乐之邦”的称号。对照历史上儒学教育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发现针对当代青年人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不仅应该教给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和科学文化知识,还应该教给他们正确的娱乐方式,以戒赌、戒斗,净化社会风气。最后则是因为:儒家主张把人的道德规范法律制度化的,这种具体作法有值得令人吸取的地方。如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国家政令来约束民众,用刑法来惩治民众,民众可以不犯,但缺少是非心。用道德来感化民众,用道德立法——礼来约束民众,民众有是非心,并能以此自勉。)^⑩孔子

又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不用礼乐来感化民众,国家刑罚就会失去准则,民众就会手足无措。)^⑪从孔子的基本意见来看,是主张“先富后教”。但是教并非是徒托空言,而是要以道德立法——礼为依据,又用国家刑法作为礼的后盾。这种礼法并用的手段,应该说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并确曾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稳定,发生过重要作用。如中国历代王朝,都是根据《六经》原则立法。史载贞观四年,全国被判处死刑的人仅二十九人,“东至干涸,南极五岑,皆外户不闭,行旅不离粮,取给予道路。”^⑫此外强调道德立法对现实社会的稳定作用,对今人治理国家,亦不乏可吸取的经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崇洋媚外”心理有所抬头,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亦有民族分裂主义者在闹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统一道德价值观念——民族意识的低落,则应是心理因素之一。因此吸取古人治理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法典,当是一项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在研究儒家伦理学说对当代中国思想建设的价值时,还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儒家伦理学说的关系?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儒家伦理学说是做人的准则。因此应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和改造儒家伦理学说,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儒家伦理学说中有价值的成份,注入新时代的政治内容,使它继续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这一批判改造的实质,是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

⑧ 《论语·季氏第十六》。

⑨ 《论语·阳货第十七》。

⑩ 《论语·为政第二》。

⑪ 《论语·子路第十三》。

⑫ 《资治通鉴·唐鉴》卷一九三,第6085页。